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圣迹

段晶晶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五台山是汉传佛教中颇具地位的佛教圣地,同时在藏传佛教中,五台山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早期传入和兴起的过程,展现出藏地和藏传佛教修行者与汉地五台山的密切关联。这使得五台山也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承载着藏传佛教的诸多圣迹内容。

关键词:藏传佛教;佛教圣迹;五台山

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08)01-075-04

陀罗尼密教在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后半叶)已经随大乘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公元七、八世纪,印度人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和不空(705-774年)先后来到汉地弘传密宗。隋唐时期,汉地佛教和密教的发展均已达至高潮。而公元八世纪,乌仗那莲花生大师也开始把密法弘扬到藏地,藏传佛教得以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汉传大乘佛教和密教的弘传和发展,汉地出现了较早的佛教圣地。

在今天,汉地有四大佛教圣地之说。大乘佛教经典所特别称道文殊师利之大智、普贤菩萨之大行、观世音菩萨之大悲,以及地藏菩萨之大愿,所以这四大菩萨特别受到佛教徒的崇敬。五台山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合称为人熟知的“四大名山”。在这四大佛教圣地中,普陀山成为观世音菩萨道场、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道场的因缘,与日本、朝鲜佛教僧人有一定关系^[1]。除五台山外的三个佛教名山均形成较晚,虽然同样也得到了藏传佛教的认可与崇拜,但是在历史上与藏传佛教的关联比较弱。至于五台山是文殊师利道场则见于大乘经典,所以古代就有不少高僧从印度和西域而来进行朝拜。同时,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关联也是非常深厚的。

唐高宗时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是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故又称《古清凉传》。《古

清凉传》云:“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雁门郡蓁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2]。在东晋以前,五台山一地被称为“紫府”,《仙经》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此段时期,五台山一带还未成为佛教圣地。

自东晋初年佛教传入五台山地区后,在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就有弥天释道安在五台山建寺,弘扬佛法^[3]。《古清凉传》记载:“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佛教兴起于北魏孝文帝时,魏孝文帝曾在五台山兴建了大孚灵鹫寺、清凉寺及周围的十二座寺院,并开了皇帝幸台的先河^[4]。此后,特别是到了唐代之后,五台山地区的佛教得到了关键的发展,不但有唐太宗贞观年间曾下诏书“五台山者,文殊闍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祇畏”^[5];也有武则天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的“神游五顶”发生,并因此敕命重建五台山的清凉寺。从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对五台山佛教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扶助。在唐代,五台山见诸记载的佛寺就有七十余所,规模宏伟。从北魏开始,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已备受推崇和景仰。

作为佛教圣地,五台山在佛经中有多处记载。比如,最受关注的是公元1世纪左右,原本出于西

收稿日期:2007-12-24

作者简介:段晶晶(1972-),女,汉族,河北固安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藏族文化史200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文化史。

域的《华严经》已提到汉地清凉山。印度三藏佛陀跋陀罗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译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九第二十七品之《菩萨住处品》中曰:“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6]。另外,还有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由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译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曰:“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由于佛经中清晰的记载,使得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的盛名远播。

佛教把《金刚顶经》中“五佛显五智”的思想结合到了五台山崇拜中,认为五座山峰是文殊菩萨大显受身之极净五体。《圣地清凉山志》^[7]还根据宋妙济《广清凉传》等文献,记载道:“中山似雄狮呈威,显大日如来地之菩提塔状;东山似矜持大象,呈不动金刚地之吉祥塔状;南山似骏马倒卧,呈宝生佛地之神变塔状;西山似孔雀起舞,呈无量光佛之涅槃塔状;北山似共命鸟交颈,呈释迦佛地之天降塔状”^[8],这一描述得到了之后藏传佛教信徒的广泛接受。

到了盛世唐朝,五台山即以佛寺众多而享誉东亚,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南天竺(今印度南部)、日本等国僧人专程巡礼朝拜。藏传佛教信徒也非常认可圣地五台山。在藏传佛教的文献中,曾记载汉地的最大山神即为五台山山神,是汉地所有土地神的首领^[9]。甚至在尼泊尔的文献中,也能够突出展现五台山的影响力。如,尼泊尔的《苏瓦扬普史书》讲到:“加德满都地区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那伽巴沙湖泊,湖内由龙王居住。后来文殊师利由摩诃支那(神州)来到此地,辟开刻湖南边的山岭,将这一湖水泄干,并在此建立苏瓦扬普寺。因此,称此地为尼泊尔”^[10]。尼泊尔将其国家的建国经历与来自汉地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建立起的这一联系,表明汉地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传说十分深入人心。甚至在藏地,有将汉地皇帝统治者称为文殊菩萨化身的习惯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藏人心中,与五台山相关连之汉地与文殊菩萨的密切联系。

《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第三十五章《遵观世音旨居汉地》中描述了一个特别视角的五台山:“汉地五台山之东,苏达苏茹河畔,德贤山上住文殊。释迦牟尼佛,四转法轮在印度,想使汉地国家入教门,即在汉地转法轮,讲述善的功德,讲述恶因招恶果,无人

肯信反而行诽谤,圣谛既然难伏众,心灰意懒返回灵鹫山,复想应以世俗谛数学行调伏,即往汉地五台山,射出五色光,该山筑有五宝塔,山上生长瞻部树,佛从顶髻射金光,金光照耀瞻部树,智慧之主文殊生”^[11]。“这时文殊菩萨想,人们不愿听佛经,反倒愿意听俗谛,不灭数学佛教难复兴,遂将八万四千数学书,装在铜质宝盒里,藏于五台山之东北角”,由此,观世音菩萨要求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去发掘五台山八万四千的法门。在叙述中,体现出这样的一种观念,即在汉地,文殊菩萨居于此处的五台山,众生更为注重数学、术数、占卜等等世间法。书中重点描绘文殊菩萨传授“八万四干部”方便法门的救度能力,且把五台山作为汉地佛教的象征。为此,有文献提及吐蕃曾由汉地取回了大量的文献进行翻译,而对这些文献,则暗指其来自于五台山,均是文殊菩萨所传承的内容,并为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所掘藏。如“成书于赤松德赞时代的医学著作《月王药诊》,是早期藏医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明确地将其渊源与圣文殊菩萨和五台山联系起来”^[12]。这种表述所传达的即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自从佛教传入藏地之后,即已开始出现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联系。五台山对吐蕃的影响,史载最早涉及唐代^[13]。有明确的观点认为,最初,五台山是通过前往藏地弘传佛法的汉僧,而被吐蕃佛教界所了解的^[14]。从此,五台山的影响达至藏地。

《柱间史》中曾经重笔描述松赞干布与五台山的传说,“松赞干布率兵辗转进抵五峰山(五台山)后,应汉唐皇帝之请,以其幻变神通建造了一百零八座寺庙,且座座寺庙的山门都依照对皇上的承诺向东朝着京都而开。寺庙中的所有佛像、佛经和佛塔亦随之自然出现”^[15]。《汉藏史籍》中也记载道:“此后,吐蕃之王(松赞干布)于是和十六名大臣一起前往汉地的五台山,为敬献汉地守护神祇、完成迎娶公主时许下的诺言、表示对盟誓的尊重,兴建了许多寺院”^[16]。此记载在今天看来虽缺乏遗迹的证实,但是五台山在藏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跃然纸上。

赤松德赞时期,五台山与藏地的联系更为密切。首先,《拔协》一书记述了吐蕃使臣桑喜等五人为求经前往汉地。在汉地求得佛经后,却听说赞普赤德祖赞驾崩,信奉苯教的大臣们毁灭佛法,拆毁扎玛的真桑本尊佛堂。众人闻言甚为难过,为将来重修佛寺,五位使臣便决定到德乌山(rde'u shan)顶的圣文殊菩萨殿中求取寺院图样,书中还记述了他

们求取图样的详细经过。“《拔协》中并没有指出“德乌山”即是五台山,但是,著名史籍《贤者喜宴》在应用《拔协》中的史料时明言,此山即是有名的五台山^[17]。《拔协》中还记载,在后来修建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时,就是以桑喜所得的五台山寺庙图为模本,才将之建成为印、汉、藏三式合一的建筑。

其次,《华严经》中曾记载有对五台山的授记,而在赤松德赞时期就已经翻译了《华严经》。据记载,藏族的文字厘定共有三次,在吞弥桑布扎时期和赤松德赞时期,“最早的译经以首次厘定的文字来翻译,即第一次用轨范的文字来抉择《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佛典的词语^[18],而且在桑耶寺初建的壁画上也画了《华严经》的内容^[19]。

第三,据记载,密教祖师熙日森哈(Srisamha)曾赴五台山,闻受一切内外密乘法。布玛莫扎(Vamalamitra,无垢友)据传说也曾到汉地五台山,在熙日森哈处求学二十年后返回印度。后布玛莫扎住西藏十三年后前往五台山,据称释迦牟尼佛法未灭时,其身体亦不灭,且于每一百年在西藏示现一位化身,以弘扬佛法^[20]。

第四,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21],事见《旧唐书》之《敬宗本纪》,载曰:“(长庆四年)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又见《册府元龟》之《外臣部·请求》,曰:“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据认为,西藏向唐朝遣使求取的是唐龙朔二年(662)京师会昌寺沙门会贽和画师张公荣绘制的五台山图。

通过对文殊菩萨化身赤松德赞的诞生过程等传说,也强化了藏地与五台山联系。《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对这一诞生过程是这样描述的:“文殊菩萨视吐蕃为调伏地,王与王妃就寝红山宫,自那汉地五台山,菩萨心射五色光,金城公主感光孕,是时公主正在做梦,梦中太阳照大地,孕得美丽一王子。……吐蕃国王赤松德赞诞生了^[22]。通过上述材料可见,以文殊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崇拜不但已经传入了吐蕃,而且还在民间传说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23]。

在吐蕃时期后,藏传佛教的五台山信仰一直在延续中。五台山并非仅仅由于吐蕃时期的事迹而仅与宁玛派关系密切。北宋元祐至绍圣年间(公元1086-1098年),藏传佛教希解派祖师帕当巴桑结曾朝拜五台山。返藏后,还依照五台山宏伟的寺庙建筑在定日建了一座寺庙。在元、明、清,由于藏传佛教教派与汉地政权建立起关系,五台山成为显示教

派在汉地影响力的场所。前有萨迦派,后有格鲁派,而格鲁派的影响则格外深远。入元后,萨迦派四祖萨班到五台山,礼谒文殊。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五月,西藏萨迦派五祖八思巴至五台山,住在寿宁寺。而据《宗喀巴大师传》中记载,宗喀巴大师转生在五台山,以班智达的形象出现。上午对许多学经弟子说法,下午对许多持金刚师说密法。其后,格鲁派的章嘉国师等也与五台山建立起了颇深的渊源。

对五台山圣地的崇敬,也导致了对五台山诸多圣迹的崇拜。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现存《五台山图》系五代时山区寺院的真实历史写照。《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中对五台山圣迹也有描述。而据汉文献载,五台山圣迹主要包括几种类型。对其简略总结如下^[24]:

第一,寺院。五台山有著名大寺十座。

第二,圣者遗迹。据《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三:“从(西)台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与维摩对谈处。两个大岩,相对高起,一南一北,高各三丈许。岩上皆平,皆有大石座。相传云:文殊师利菩萨共维摩相对见谈之处。其两座中间,于下石上有师子蹄印,踏入石面,深一寸许^[25]。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记载,曾在金刚窟见到佛陀波利,“时……等三十余人随照至金刚窟所,亲示般若院,立石标记^[26]。

第三,石窟。《古清凉传》载:“金刚窟者,三世诸佛供养之具多藏于此。按祇洹图云,祇洹内有天乐一部,七宝所成,笈曰,又按灵迹记云,此乐是楞伽山罗刹鬼王所造,将献迦叶佛,以为供养,迦叶佛灭后,文殊师利将往清凉山金刚窟中,释迦佛出时。却将至祇洹,一十二年。文殊师利还将入清凉山金刚窟内。又有银箜篌,有银天人,坐七宝花上,弹此箜篌。又有迦叶佛时金纸银书大毗奈耶藏银纸金书修多罗藏。佛灭后,文殊并将往清凉山金刚窟中^[27]。据说佛陀波利最后隐于金刚窟中。其后有名的高僧如无著、法照等都曾在金刚窟见到文殊化现的种种神异之事。

第四,岩洞。《广清凉传》卷下载:“那罗延洞者,在东台东侧,洞门向东,深二丈余,……,然深不可测,时有冷风拂面,传云:此洞与金刚窟皆大圣之所宅也。”敦煌遗书《五台山赞》云“佛子北台东脚那罗延,弥覆盘徊曲连,有一天女名三昧,积米如山供圣贤^[28]。

第五,佛塔。《古清凉传》中载:“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烧身寺,其处,先有阿育王古塔,至北齐初年,第三王子,于此处求文殊师利,竟不得见,乃于

塔前,烧身供养,因此置寺焉”。

在藏传佛教中曾有格鲁派章嘉活佛整理的五台山圣迹文,还有罗卜桑丹津所著“五台山旅行指南”等书。以下则是从藏传佛教角度记述的五台山圣迹。一般认为五台山曾有一百零七处圣迹,有的已无明显的踪迹,一些已被历史湮没。可以看出以藏传佛教的角度而言,五台山所拥有的圣迹要点:

第一,古德们说:五个台是报身的五蕴清净为五种智慧而自现五方佛,如前文所列举。若论化身净土,中台是殊胜的文殊童子道场;东台乃智慧文殊道场,主息法;南台道场主增法;西台系狮吼文殊道场,主怀业;北台是无垢文殊道场,主诛法。修法者可根据自修的不同本尊或息、增、怀、诛四大事业选择相应的地点,可获得快速的加持。

第二,最有加持力的那罗延窟位于东台的东北面,内有龙王的化身。金刚手菩萨与文殊菩萨曾于此探讨佛法。

第三,祖师塔旁有一个金刚窟,是佛与佛子的密坛。迦叶佛时,罗萨王将金银写成的三藏显密经续以自己身上的宝贝装饰后伏藏于此。以后印度的持明大成就者佛护尊者(中观应成派初祖)在此虹化。大圆满布玛莫扎祖师以无死虹身于娑婆世界未坏之时常住于此,每一百年化身一次到藏地弘扬无上大圆满。

第四,上善财洞乃文殊菩萨与善财童子见面的地方,具有大加持。出上善财洞后边的一个小门五十米就是天葬场,这是第三代大圆满祖师熙日森哈虹化成就的地方。下善财洞寺院后方有法王顶果钦哲仁波切的纪念塔。

第五,清凉寺有一个法座,据传说,无论上面坐多少人也不会满,此系古代龙王供养菩萨的宝座。

第六,灵鹫山上有菩萨顶,乃五台山缘起第一寺,具大加持力。

第七,大白塔处是五台山的中心标志。当年罗汉摄摩腾尊者以神通观出内有舍利子,是最重要的圣迹。

第八,大白塔上方南面有一个佛的脚印,是佛准备圆寂时留下的一个脚印,脚跟上有千幅法轮的吉祥图案,帮助将来朝拜的人清净业障、往生净土。这是唐朝时名显(译音)的高僧将印度的脚印图描绘给皇帝供奉朝拜,明朝大德明启(译音)化缘后刻于石头上供奉于白塔的。

第九,大白塔东面有个门,出门后三十米左右系文殊菩萨的发塔^[29],相传文殊菩萨显圣遗留的金

发就在其中。

汉地与藏地对五台山佛教圣迹的描述,显示出明显的特点,即在藏传佛教所提炼的圣迹形式中,不但包括了在汉地文献中所记录下来的圣迹内容,还包括了在此基础上叠加上去的藏传佛教的圣迹内容。而在实质上,由于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历史和发展,使得其可以在圣迹内容上予以补充,并在五台山圣地协调存在。

参考文献

- [1]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71.
- [2]大正新修大正藏经[M].古清凉传,Vol.51:2098.
- [3][4]肖文.五台山佛教简史[J].五台山研究,1992(4).
- [5]明释镇澄.清凉山志[M].卷五“帝王崇建·唐太宗”.
- [6]大方广佛华严经(印刷赠品)[M].
- [7]章嘉若贝多杰.圣地清凉山志[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藏文版):3.
- [8][12]扎洛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J].民族研究,1998(1).
- [9]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奥地利).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254,261.
- [10]肖雨.五台山与尼泊尔佛教文化交流[J].五台山研究,1997(1).
- [11]尔金林巴,掘藏.莲花生大师本生传[M].洛珠加措,饿东瓦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245.
- [13]邓小咏,王启龙.五台山——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J].五台山研究,2001(3).
- [14][17][23]扎洛.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J].民族研究,1998(1).
- [15]印度)阿底峡尊者,发掘.西藏的观世音[M].卢亚军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252.
- [16]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籍[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97.
- [18]杨岭多吉.四川藏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364.
- [19]尔金林巴,掘藏.莲花生大师本生传[M].洛珠加措,饿东瓦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550.
- [20]敦珠法王.西藏古代佛教史(台湾)内部教材[M]:104.
- [21]“五台山图”就是绘有五台山及其各处神灵圣迹的佛画。
- [22]尔金林巴,掘藏.莲花生大师本生传[M].洛珠加措,饿东瓦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374.
- [24]大正新修大正藏经[M].广清凉传,Vol.51:2099.
- [25]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M].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M].宋高僧传:2061.
- [27]大正新修大正藏经[M].古清凉传,Vol.51:2098.
- [28]有S5573、S5487、L.0278、北8325等10余件。
- [29]根送丹增.五台山圣地[M].

馆 1990: 756.

[15]傅静坤.法国民法典[M].

[16] 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化过程亦是其文化价值观扩张的过程。

[17]袁伟时.中国现代思想散论[M].“西方输入与优势地位的表失”, 69- 73.

[18]何新.危机与反思(上册) [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1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 170.

[20]杜维明.“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创新”中外文化比较研究[M].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64- 93.

[21]F·A·哈耶“个人主义: 真与伪”个人主义经济秩序[M].贾湛, 文跃然, 等译。

[22]蒋立山.中外法学[M].“中国法制现代建设的特征分析”。1995 4): 11.

[23]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

[24]小杉丈夫。中外法学[M].“美国法文化对日本法律实务的影响”, 1995 4): 74- 75.

[25]转引自李卫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M].

[26]樊刚“中华文化, 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经济文论[M].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The Conflict and Choice of Chinese Law Culture

Qi Xiang

(Prefecture of Qian Southwest, Guizhou 562400)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current Chinese leg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o put forward some ideas about it. Each system is based on its culture. The dilemma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resulted from the discrepancy of local idea and the idea required by the law, which forms the potential conflict of Chinese law culture. “To rule by the law” needs the explanation and comment of this conflict in order to decide how to do next. The conflict is not only a phenomenon of law but a social phenomenon.

Key words: Chinese law; law culture; conflict; choice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

[上接第 78 页]

Wutai Mountain and Sacred Relics of Tibetan Buddhism

Duan Jinjin

(Institute of Tibet Studies, the Center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Wutai Mountain is considered as a holy place by Chinese Buddh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as well. The cours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dicat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Tibetan practitioners and Wutai Mountain, which renders Wutai Mountain come to be an important holy place for Tibet Buddhism and preserves much sacred relic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its unique way.

Key words: Tibetan Buddhism; sacred relics of Buddhism; Wutai Mountain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